

因为爱书，我从小就羡慕在书店或图书馆工作的人。心想，如果他们也如我一样爱书的话，可以天天与书为伴，无疑是“老鼠跌进大米缸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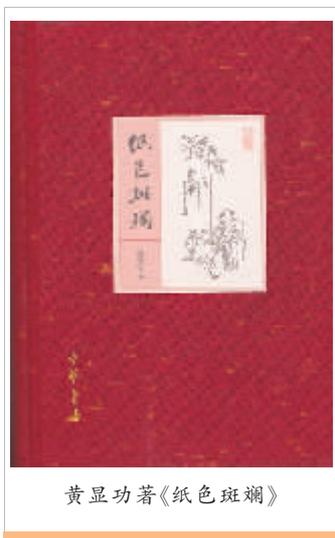
社会分工各有不同，虽然我并没有那样的机遇，却始终抱着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的念想。但我却有认识不少在书店或图书馆工作的书友，间接地获得不少关于书的信息。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黄显功先生，就是其中值得称道的一位。十多年前，上海图书馆举办老诗人任钧先生作品研讨会时，与他不期相遇（那天他是会议主持人）。时光漫漫，我逐步了解到，他在图书馆做的是购书、理书、找书、查书、勘书、编书、写书……只要在“书”字前面加个动词，就是他每日的工作内容。其间我有所需，总得他的关照，让我与书更亲近些，这亦是书的媒介作用，或说是因书而起的缘分。最近读他的《纸质斑斓》（中华书局出版），更是一次集大成的关于书的精神享受。

从中，我知晓，显功服务于上海图书馆二十余年，汇编专集、举办展览等大大小小的项目做了不

下百项，作为主事者、参与者，他都要殚精竭虑，沉潜案几，写下一篇篇序言、后记。序跋之文本无定法，却是一种难度写作，不少作者甚至名家学者，都视为畏途，可见写作此类文字之不易。首先，作者对所写的对象从宏观到微观，都须十分熟稔，了如指掌。这序文就是篇繁简精当的导读，引领读者或观者走入未知世界，开阔眼界，汲取更多知识养分。其次，这序跋，还得有作者的观点和思想，甚至感情和温度。总之，在普及知识、传播文化的基础上，要有独到的分析，通过对具体内容的条分缕析，道出主办者的主旨、项目（主要是展览和出版物）的主题、背景、特色、优劣、得失等等。不但给读者更多的知识启蒙，更有深邃的思想启迪。比如，上海图书馆的图书文献资料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，馆中之馆的文化名人手稿馆更是蜚声文化界，馆里经常举

## 以书为缘

■ 韦 决



黄显功著《纸质斑斓》

办各种类型、专题的手稿展览，他就汇编《妙笔华章——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》一书，其序言《手稿的文本形式与特征》，就是一篇精彩的专题论文，且图文并茂，文采斐然。

从中，我也获得了新的知识点，或是增加不少解疑释惑的快慰。我曾经知悉，由金融家叶景葵，以及张元济、陈陶遗等创办的合众图书馆，是集私人捐赠的一所规模不小的私立图书馆，但建国后这家图书馆如何变迁、图书流向何方？再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办有海光图书馆，请戏剧家、藏书家宋春舫主持馆务，每年向境外采购诸多西文书刊，1949年后这家图书馆的图书去向如何？通过阅读书中《海纳百川 积淀文化 服务社会》一文，解开了心中的疑团。前者于1953年全部捐献给政府，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，1958年与上海报刊图书馆等四馆并入上海图书馆。后者的书亦由银行捐赠国家，并转藏于徐家汇藏书楼，作为上海图书馆的分馆向社会开放。该文把上海图书馆的创建及发展的脉络一一厘清，让人清晰地了解上海

图书馆发展的曲折经历。一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，能有今天的文化自信，与图书馆所起的承继优秀传统、积累文化精粹是分不开的。

从中，我亦欣赏了精彩纷呈的视觉艺术盛宴。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有不少亮点，其中之一即版画与藏书票的收藏、展览与研究。无论是图书馆在提倡藏书、普及版画藏书票知识的应有功能上，还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使然，抑或是把两者作了有机结合，作者矢志不渝地为上海图书馆建立了一种美术类文献学科，在其主编的《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作品选集》一书中，他以《方寸容千里“书蝶”入万家》为题撰写前言，梳理了西方藏书票传入中国的路径：经鲁迅先生倡导，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，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创作群体，并受到中国读者喜爱。为了推动藏书票艺术的发展，从而倡导爱书、读书、藏书的良好风气，上海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藏书票创作、展览与研究、普及工作，使被誉为“纸上蝴蝶”的藏书票传递更多、更浓的书香，使这座城市弥漫更为丰富的文化气息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张崧年即张申府，与梁漱溟是顺天中学堂的同学，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“周恩来、朱德的入党介绍人”。此信写于1917年，距张申府毕业之期尚有三月，他受此限制不得参加天津公署的留学考试；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，请求为其赴考行以方便。此事后来如何，究竟蔡先生是否“为之备文送考”，张申府又是否赴考，已无从知晓；但我们知道，张申府毕业后留校做了预科助教，可见留学一事是未曾成行了。而后张申府结识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，则是后话了。

终其一生，不管际遇如何，梁漱溟与张申府两人都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。书信集中也收录了一封张申府1959年的来信，笑称“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，其人神情，弟觉与兄绝似”。还赋诗一首，诗曰：“何似吾友梁漱溟，不言不笑仁意充。认真郑重世无两，偶然莞尔如春风。”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脚。

另一封信是为学生黄文弼所写：

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，拟在大学求小事，藉便读书。据云先已谒公。更属冥代陈，即乞鉴察是幸。（1919年）

黄文弼是1949年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，1928年涉险进入西域戈壁，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动了近40年。从这封信来看，黄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，当属梁漱溟代陈之功了。不意梁漱溟与黄文弼之间竟有如此渊源。

### 与吴承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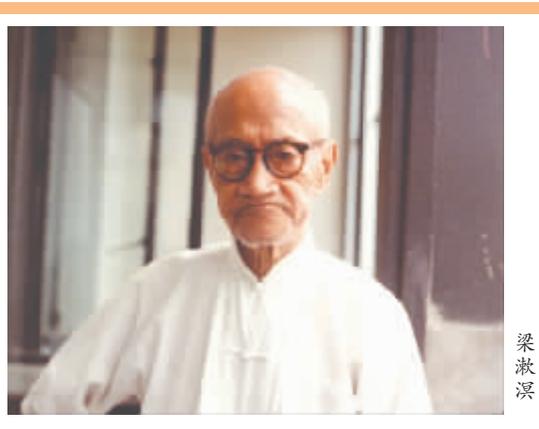
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并称“北吴南黄”的吴承仕先生，也曾一度与梁漱溟有过交往。辛亥革命后，吴先生入司法部任金事，1924年方离任；而1916年，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（梁漱溟舅父）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书；吴梁两人因同任司法部而得熟识。梁漱溟以《究元决疑论》向吴先生请教，吴先生遂复一信，面交于他。这封信虽不足千言，但学术价值极高，可见出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：

东冥先生惠鉴：手示敬悉，自退直归，

籍读著论一过，立谊审谛，深达理要，钦迟何似。承仕学术亡似，辨智不周，虽尝获事大师，得闻胜语，间亦涉猎佛乘，乐观慈氏世亲之书，迫于人事，未尝为深沉之思，疑殆尚多，卒未窥其究竟，又于大秦驴唇之文素所不习，远西哲人所说，未能讽籀，无以和会东西，校其口劣。（1910年代）

信中，吴先生先是谦虚地表示，自己虽曾追随大师（章太炎）左右，也曾涉猎佛乘，但未曾深思其中义理，仍有许多疑虑，并且对西方哲人之说并不熟悉，对《究元决疑论》无从置喙。客套过后，吴先生将个人所见和盘托出，如：“究元论所陈三谊，深悞鄙心。”对其不妥之处直言相告，如：“所谓不可思议者，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，即真如，绝待，离四句，绝百非之说。然名谊似不相副。”梁漱溟在《究元决疑论》中解释“不可思议”时写道：“西士明哲颇复知之：……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，空间不可知，力不可知，物质不可知，流转不可知等。”吴先生对此有疑义，认为：“……然论中引斯宾塞之言，实非其比。盖彼所谓时间空间云者，即不谓中之境界相，质力流注云者，即不谓中之无明业相……所谓不可知者，谓凡小未能证知，菩萨未能究竟知，非真不可知也。”又如，吴先生提出：“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，未尽与百法相符。欲者，别境心所之名，苦者，五受之一，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实。”1923年，《究元决疑论》被收入《梁漱溟卅前文录》出版时，梁漱溟在附记中表示，“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唐糊涂，足以误人，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”，更是直承决疑论中谈苦乐这一段实为“谬误的大端”。

吴先生通日文，手中有些日本学者的印度哲学著作，梁漱溟入北大后，还曾向吴先生借阅过，作为讲印度哲学之助。此后时移世易，两人音讯隔绝。1976年，梁漱溟检出此信，写下：“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。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，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，而未知其详。念之惨然。”往



梁漱溟

昔相与探讨切磋的时光已不可复得，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伤。

### 与景嘉

在其最为看重的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日文译本序言中，梁漱溟写道：“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，景嘉先生审定之，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，曷胜感激。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。”——此书在日本的出版，与景嘉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景嘉是清皇室后裔，据传，1933年，刚过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长春拜谒溥仪，溥仪极为赏识其为人，以私人之资派遣他与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学。他从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，后又赴日本定居。《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》（大象出版社，2009年）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书信五通，此次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书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学生和崎博夫书信一通，《人心与人生》日译本的出版一事，终于可以拼凑完整了。

1981年，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，极言自己对梁先生的仰慕之情，并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将《人心与人生》在日本出版，他愿助一臂之力：

漱溟前辈先生道鉴：……门人和崎博夫持来大札，始知公巍然健在，神智未衰，万物皆流，而金石独止，为之狂喜……大稿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极思一读，不知有副本否，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。如荷同意，在此地出书，嘉为校录之役，尤引为大幸。（1981年）

也许是景嘉先生寄信时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，梁先生转而向溥杰先生求问景嘉的地址，故有了下面这封来信：

梁老：承囑之事，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“马大哈”，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，未能有以应命，实不胜惶赧之至。现将景嘉先生的住址，记录如下，聊供参考。（1982年）

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，曾与景嘉一同赴日留学。有了他给出的地址，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给景嘉的第一封信：

景嘉先生尊前：溥杰先生转来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，敬捧读。远承询及鄙见，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陈……（1982年）

此信是据梁先生家中所存的书信底稿录入，遗憾的是此底稿已残缺不全。此后不知何故，梁漱溟与景嘉的书信往来中断了。直到1985年，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来信，重提《人心与人生》一书在日出版之事，并邀请梁先生去日东游；因年事已高，不便出行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请，但同意将《人心与人生》译成日文。随后几通书信中，两人探讨了一些修订、翻译的问题；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，梁先生就日译本一事致信其学生和崎博夫：

和崎博夫先生大鉴：……《人心与人生》日译本之得以问世，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。待先生来华把晤时，当面致谢忱。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，用作教育基金，以资助敝国留学生，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，本人完全赞同，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。（1987年）

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代表理事，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。在该会推动与资助下，1986年，《人心与人生》日文译本问世，此后又有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乡村建设理论》两书的日文译本出版。

此外，书信集中尚有许多珍贵信件是首次公开，如曾支持章士钊“中西方文化调和论”的陈嘉异，读罢梁漱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文后，“不禁热血沸腾，绕室疾走，满腔欣慰欲狂，感慨欲涕之情绪直不能自持”（约1930年），后转而支持梁漱溟……信件繁多，内容丰富，无法在此一一详举，只有留待读者自行阅读发现了。